



澳门研究丛书  MACAU STUDIES

韦卓民与中西方文化交流

——“第二届珠澳文化论坛”论文集

Wei Zhuomin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珠 海 市 委 宣 传 部
澳 门 基 金 会 / 主 编
华 中 师 范 大 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澳門基金會
FUNDAÇÃO MACAU

目 录



上编 珠海、澳门与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

- 珠海澳门早期历史文化的特点 肖一亭 / 003
- 清人张汝霖与香山 赵春晨 / 021
- 商办之殇
- 论清末香洲商埠衰落之潜因 王 杰 韩明章 / 030
- 中山港开港的历史意义价值
- 纪念唐家湾开辟中山港八十年 陈树荣 / 047
- 黄宽留学英国考论 张 娟 / 053
- 政治纠葛与“城”“郊”依存
- 从近代湾仔变迁看澳门的辐射作用 赵立彬 / 067
- 香山与上海 宋钻友 / 085
- 鲍留云与《致富新书》 吴义雄 / 099
- 淡归金堡出家前后的夷夏观比较
- 兼论儒佛夷夏观之异同 何方耀 / 116
- 西学汉籍在东亚的流播研究 张西平 / 131
- 中欧文化交流之一面：耶稣会书件里
所记载的异国动物 [德] Roderich Ptak / 154

清代“摩卢”人考	张小贵 / 179
对五桂堂印本《澳门番语杂字全本》的初步分析	
——兼及与《澳译》的比较	周振鹤 / 193
晚清澳门华政衙门源流考	张廷茂 / 210
澳门开埠与近代广东文化特色优势的形成	黄晓东 / 231
澳门博彩法律制度历史	邱庭彪 / 237
清季民初粤港澳走私述略	连心豪 / 242
陈子褒与近代港澳教育改革	吴洪成 王景 / 260
港澳在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涉中的枢纽作用	
——从卫三畏与罗森对 1854 年日美建交的贡献说起	陶德民 / 285

下编 韦卓民与中西方文化交流

韦卓民与华中大学的“特色办学”	马敏 / 297
韦卓民关于培根哲学思想初探	张舟 / 302
韦卓民论黑格尔哲学的运思理路	张卫国 / 312
韦卓民与亚里士多德哲学	吴胜锋 / 321
逻辑思想润泽后辈	
——韦卓民逻辑思想初探	宋荣 / 330
韦卓民的康德哲学翻译和研究	王世鹏 / 349
韦卓民眼中的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关系	
——隐含的“他者”伦理视野	陈广培 / 359
Wei Zhuomin and the Spirit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Terry Lautz (劳泰瑞) / 373
韦卓民高教管理思想及其当今价值	中国昌 贺鹏丽 / 394

韦卓民先生的故乡
 韦卓民先生的哲学
 知识界现状的反
 基督教大学对世俗
 韦卓民为个案的
 韦卓民与华中大学
 积淀与传承：韦卓

 从韦卓民先生看中
 在国家与上帝之间
 ——介绍 1926 年

..... 张小贵 / 179

..... 周振鹤 / 193

..... 张廷茂 / 210

..... 黄晓东 / 231

..... 邱庭彪 / 237

..... 连心豪 / 242

洪成 王 景 / 260

..... 陶德民 / 285

完

..... 马 敏 / 297

..... 张 舟 / 302

..... 张卫国 / 312

..... 吴胜锋 / 321

..... 宋 荣 / 330

..... 王世鹏 / 349

..... 陈广培 / 359

(劳泰瑞) / 373

马 贺鹏丽 / 394

韦卓民先生的故乡珠海翠微考略 张建军 / 407

韦卓民先生的哲学研究及其所引发的关于
知识界现状的反思 高新民 / 423

基督教大学对世俗化潮流的应对：以华中大学和
韦卓民为个案的考察 章 博 / 444

韦卓民与华中大学的战后计划 刘家峰 / 460

积淀与传承：韦卓民与华中大学基本精神的构建
..... 岳 奎 邵彦涛 / 479

从韦卓民先生看中国基督教会的历史和现状 徐以骅 / 490

在国家与上帝之间
——介绍 1926 年底关于韦卓民思想的一件档案 黄岭峻 / 500

从韦卓民先生看中国 基督教会的历史和现状

徐以骅*

韦卓民(1888~1976)先生是我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基督教教育家和宗教领袖人物之一,同时也是享誉海内外的哲学和基督教神学学者,在中国基督教学术研究领域一度曾有“北赵(紫宸)南韦(卓民)”之称。与同龄人赵紫宸相比,韦卓民甚至有更高的学历(文华书院学士、哈佛大学硕士、伦敦大学博士)和更高的教育职位(华中大学校长),两人均具有较长的学术生涯,为中国基督教会和宗教研究学界留下了大量的思想和文字资料。

目前国内外关于韦卓民的生平事迹以及学术成就已经有不少研究论著。^①本文不拘于文献档案,而是从中国基督教会史的历史、国际地位和现状的三重视角来讨论韦卓民以及他所代表的中国基督教知识界。此三重视角分别为:第一,中国基督教会的谱系;第二,中国基督教的国际地位;第三,后传教时代的中外(美)宗教互动。

一 中国基督教会的谱系

目前,中国基督教史既有专题性研究,又有框架性研究。专题性研究可分为教会教育、医疗、慈善、传教、传记等类;而框架性研究则是运用某种

* 徐以骅,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① 关于韦卓民的研究文献数量较多,可见马敏、周洪宇、方燕主编《跨越中西文化的巨人——韦卓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马敏编《韦卓民基督教文集》,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雷法章主编《韦卓民博士教育文化宗教论文集》,台北:韦卓民纪念馆,1980。



理论或观点方法作为研究和叙事框架，如“基督宗教入华四期说”或“中外新教权力建制”^①等，来分析中国教会史某些史实。当然在实际操作中两者通常是相互重叠的，只是侧重点可能有所不同。

关于中国基督教会的研究和叙事框架，最主要的恐怕莫过于所谓传教策略的两条路线之争。此种分类性分析框架的始作俑者柯文（Paul A. Cohen），曾把新教入华后的传教策略区分为直接与间接两类，其代表人物分别为戴德生（Hudson Taylor）和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②后来这种区分还被演绎为下乡和进城之别。不过，在1877年、1890年和1907年三次在华传教士大会之间，在华传教士对直接传教的重要性和首要性还是具有一定的共识。

此后这种“传教士共识”却在传教的实践中逐渐消磨。直接宣教与间接宣教两条路线分道扬镳，且渐行渐远。一方面，城市地区“教人要紧”的间接宣教事工日益发达；另一方面乡村地区的“灵魂拯救”事工渐趋深入，甚至形成“外国人管教育、中国人管宣教”的传教模式。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的现代派（社会福音派）和基要派（保守福音派）争端被带入中国，进一步加深了在华西方差会两大阵营之间的裂痕，^③并且基本上形成了城市教会与乡村教会在社会学和神学意义上的对立。

西方差会的两条路线之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左右了中国基督教教会的发展路线。根据与西方差会远近亲疏的关系，中国基督教教会通常被分为三个基本派别，即自立、本土和本色三派，其中本土派与西方差会几无直接关系，自立派与之藕断丝连，而本色派与之关系最为密切，故被称为“中西

① Sino-Foreign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 见 Daniel H. Bays, "The Growth of Independent Christianity in China, 1900 - 1937", in Daniel H. Bays 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07-316.

② Paul A. Cohen, *Missionary Approaches: Hudson Taylor and Timothy Richard*, Harvard University, Paper on China, Vol. 22, 1957.

③ 关于中国基督教传教运动中的现代派和基要派之争，可参见 Xiyi Yao, *The Fundamentalist Movement among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1920 - 1937*, Lanham,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3; 姚西伊：《二十世纪初在华自由派与基要派传教士之争的历史根源》，载王忠欣主编《基督教与中国——传教士文化》，多伦多：加拿大恩福协会，2003年，第111-133页。

基督教教育家和宗
神学学者，在中国基
会”之称。与同龄
学士、哈佛大学硕
士），两人均具有较
大量的思想和文字

已经有不少研究论
史、国际地位和现
实图景。此三重角
度的国际地位；第

究。专题性研究可
研究则是运用某种

《跨越中西文化的巨
出版社，1995；马敏编
章主编《韦卓民博士教



教会共治”^①或“中西新教权力建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与本色派或所谓大公会和普世运动路线最有渊源，该运动的骨干成员主要来自本色派阵营尤其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中华圣公会以及圣约翰大学，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以及纽约协和神学院也有机构和思想上的渊源关系。^②说来有趣的是，韦卓民后来的夫人戴惠琼就是纽约协和神学院1930年神学学士学位获得者。

不过根据神学倾向，中国基督教会又可分为自由、中间和保守即左、中、右三派，三派均有自己的“基础设施”或组织机构。如就神学教育而言，中国高端基督教神学教育就有代表自由派神学的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代表保守派神学的华北神学院及后来的中华浸会神学院，以及代表中间派的金陵神学院。^③当然这种区分并非绝对，在中国基督教会左右两派极化的背景下，保守中间立场反而不易。当然根据受教育背景，中国教会领袖又可有“海归派”和“本地派”之分。如果按照“宗教利益”来分，中国教会还可以分出“高教系”、“青年会系”和“农林系”等。而宗派背景更是中国教会的传统分派标准，宗派内部也常常有派别之分，如圣公会中的高派（崇仪派）和低派（崇信派）之别。基督教宗派被引入中国向来是西方差会在华传教最受诟病的问题之一，诚静怡100年前在爱丁堡国际宣教会议使其备受关注的演讲要点其实也就是中国不需要西方的宗派。不过平心而言，鉴于新教与生俱来的分离主义倾向以及中国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拉帮结派的传统，即使没有外来因素，宗派林立现象在中国的出现也是早晚的事。

韦卓民作为“高教系”，其对中国基督教会乃至中国社会的影响与上述分类自然有密切关系。一般来说，“高教系”是“本色派”甚至是自由派的天然盟友。与强调教会独立的“自立派”和强调本土实践的“本土派”相比，“本色派”在融合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沟通和影响知识界、译介西方神学和宗教思想，以及创造基督教实践的中国形式如宗教文学、仪式和圣歌方面，均有重大的建

① 乐灵生：《近二十年来中国基督教运动的改革与进步（1900~1920）》，载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蔡咏春、文庸、杨怀周、段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1985，第93页。

② Xu Yihua, “‘Patriotic’ Protestants: The Making of an Official Church”, in Jason Kindopp and Carol Lee Hamrin eds., *God and Caesar in China: Policy Implications of Church-Stats Tension*,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4, pp. 107-121.

③ 徐以骅：《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树，而且领域的‘以及“有较大的社韦卓环顾整个过平心而干高端神晓的布道还有不少“小众”，并非在任的处境下，在国内却

目前学业表述”：以及“全球势的基督教以及西方对现在一次大种提法其实的各种形式基督教文化

① 此类说
② 关于三Christia
2005，
教育史



中国基督教三
该运动的骨干
会以及圣约翰
想上的渊源关
1神学院 1930

和保守即左、
究神学教育而
宗教学院、代
表中间派的金
派极化的背景
会领袖又可有

中国教会还
背景更是中国
会中的高派
来是西方差会
宣教会议使其
平心而言，鉴
和拉帮结派的
晚的事。

影响与上述分类
由派的天然盟
相比，“本色
学和宗教思想，
均有重大的建

载中华续行委办会
泳春、文庸、杨怀

Jason Kindopp and
hurch-Stats Tension,

树，而且有着更高的神学、社会和文化诉求，但“本色派”尤其是在教会高教领域的“本色派”有时也陷于“上面抓不住学术界，下面抓不住教会群众”，以及“有学而无神”或“有神学而无教会”的困境。因此“高教派”尽管有较大的社会影响，但其对中国基督教会本身的贡献却反而被打了折扣。

韦卓民是在华教会大学所有华籍校长中神/哲学造诣最高的一位，而且环顾整个中华基督教界，在神/哲学领域才识可与之相匹者亦寥寥无几。不过平心而论，韦卓民尽管对教会高等教育贡献颇巨，然而与包括赵紫宸等一千高端神学家一样，韦卓民等对基督教会本身的影响却通常不及那些家喻户晓的布道家，即那些中国教会的“巨人”。^① 韦先生的不少论著由英文写成，还有不少论著则完成或出版于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对象自然更为“小众”，只是在近年来才成为中国基督教思想史重要的研究资源。这样说并非在任何意义上贬低韦先生的学术成就和贡献，而是说明在当时中国教会的处境下，虽然韦先生所代表的高端基督教知识分子能在国外博得听众，但在国内却曲高和寡，难以影响广大信众。这当然是中国基督教会的悲哀。

二 中国基督教的国际地位

目前学界尤其是传教学界关于世界范围基督宗教基本上有以下三种“专业表述”：“基督教王国”（Christendom）、“世界基督教”（World Christianity）以及“全球基督教”（Global Christianity）。其中反映根植于地缘政治和经济权势的基督教信仰国际性、基督教差传与西方地缘政治权势扩张千丝万缕关系以及西方对基督教的支配的“基督教王国”模式或称呼显然已经落伍。而出现在一次大战后的“世界基督教”和20世纪80年代初的“全球基督教”两种提法其实大同小异，均被用来描述基督教跨国现象或世界范围基督教信仰的各种形式的文化表述，强调的是文化和神学而非政治面向，以及世界各地基督教文化的互动、扩张、借鉴、综合和变革等。^②

① 此类说法见赖恩融著《中国教会三巨人》，张林满饒等译，台北：基督橄榄文化，2002。

② 关于三种表述的讨论见 Todd M. Johnson and Sandra S. Kim, "Describing the Worldwide Christian Phenomenon",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Vol. 29, No. 2, April 2005, pp. 80-84. 见徐以骅《当代国际传教运动研究的新趋势》，载徐以骅《中国基督教教育史论》，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257~271页。



事实上被视为基督教普世运动的开端的爱丁堡国际宣教会议已经在讨论“世界基督教的兴起”问题。^①在这次宣教会议上，来自伦敦会北京米市堂的助理牧师诚静怡作了两次演讲，特别是阐述建立一个“超宗派的、完全自立、合一的”中国教会的主张，给大会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②中国基督教会从此在国际基督教舞台上正式亮相。^③此次会议的出席者有来自全世界159个基督教宣教团体的代表1200余名，其中非西方代表只有19名。在这些非西方代表中亚洲人有8位，其中中国人有3位，除诚静怡外还有上海沪江大学代理校长及浸信会神学院教授董景安以及上海长老会信徒张廷荣。当时正在英国留学的女医生康成和一位名字已难稽考的王姓博士也参加了会议。^④在此后的国际宣教会议如1928年耶路撒冷国际宣教会议和1938年马德拉斯国际宣教会议上，中国基督教会不仅派遣了阵容较强的代表团，而且全面阐述了中国教会的主张，在国际基督教界的地位和声誉显著提高。

中国基督教会对于普世教会的参与还表现在担任普世教会的高层职务和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的访学和讲学上。就前者而言，王正廷、曹雪赓、朱友渔、顾子仁和丁光训曾先后担任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干事，王正廷、曹雪赓和顾子仁还担任该同盟副会长，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还担任过国际宣教协会副会长。1948年赵紫宸出任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主席（为六名主席之一），代表所谓后进教会。就后者而言，早在1894年美国建阳学院出身的中

① Peter C. Phan, "The 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 Edinburgh 1910: Challenges for Church and Theolog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Vol. 34, No. 2, April 2010, p. 105; Brian Stanley, *The 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 Edinburgh 1910*,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9.

② 刘家峰：《从差会到教会：诚静怡基督教本色化思想解析》，载《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2期。

③ 此前中国基督徒曾参加过几次世界基督教学生联盟的国际会议。如1899年福州神学院教授陈敏望出席美国诺思菲尔德及威廉姆斯顿的世界学盟第二次会议，成为青年会派往国外的第一人。1900年南京金陵大学黄荣良出席法国凡尔赛的世界学盟大会；1902年北京大学陈维城出席丹麦苏罗城的世界学盟大会和挪威克利苟尼亚的青年会世界大会；1905年曹锡庚出席荷兰新德城的青年会世界大会。见赵晓阳《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早期创建概述》，载《陕西省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④ 2010年爱丁堡召开百周年纪念大会，在此次会议的450名与会者中，中国代表共5位，其中有来自香港的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总干事苏成溢牧师和圣公会圣匠堂主任陈国强牧师，以及来自中国内地的中国基协进会副会长高英牧师、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文革牧师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孙毅教授。

国圣公
聘担任
不绝，
有在美
中韦卓
亚大学
教会学
及其他
命^④，
传教”
韦
问教授
笔者若
基督教
教会中
为领先
事
用英语
大学尤
会事工
文华大
文介绍

① 徐
② 梁
人
③ 中
(1
④ 徐
北
⑤ 关
运
⑥ 徐



国圣公会教牧颜永京就曾赴英美宣讲中国教会状况。^①从1918年刘廷芳受聘担任协和神学院心理学和宗教教授助教以来,中国教会人士赴美讲学络绎不绝,刘廷芳、洪煊莲、余日章、顾子仁、赵紫宸、徐宝谦以及韦卓民等都有在美国顶级神学院授课的经历,他们中有的还进入欧美一流大学演讲,其中韦卓民就是一例,他曾受邀在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著名学府讲学,把中国文化献上国际学术的“圣坛”。^②这些中国教会学者尤其是“高教系”学者与“留美基督教青年”^③一样,在基督教及其他领域担负着“向美国诠释中国”和“向中国诠释美国”的双重使命^④,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当前国际宣教界已蔚然成风的“逆(反)向传教”的先声。^⑤

韦卓民1945~1946年间出任纽约协和神学院首任路思义世界基督教访问教授,这是中国人在美国顶级神院校担任的第一个正式的宗教讲座。故笔者若干年前曾把赵紫宸出任世界基督教协会主席和韦卓民获得路思义世界基督教教席的殊荣称为标志性事件,“表明中国基督教会在当时的所谓后进教会中,或至少在东亚地区,在基督教组织和思想建设的整体水准上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⑥

事实上,当时中国基督教会真正具有国际性或活跃于国际基督教舞台并用英语写作的人士,大多不是出于作为中国教会最高教育和神学机构的燕京大学尤其是其宗教学院,就是出于作为中国教会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中华圣公会事工(包括教牧师)群体,尤其是该会名义上的下属机构圣约翰大学和文华大学的毕业生。20世纪20年代国际基督教学运要求中国基督教学人撰文介绍中国基督教会的形势,据此结集出版的两本书分别为《中国人眼里

① 徐以骅:《颜永京与圣公会》,《近代中国》2006年第10辑,第193~215页。

② 梁冠霆:《留美青年的信仰追寻:北美中国基督教学学生运动研究(1909~1951)》,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218~224页。

③ 中国留美基督教青年运动见上引《留美青年的信仰追寻:北美中国基督教学学生运动研究(1909~1951)》。

④ 徐以骅:《纽约协和神学院与中国基督教会》,载徐以骅《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史论》,台北:宇宙光,2006,第191页。

⑤ 关于“逆(反)向传教”,见徐以骅、章远、朱晓黎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当代传教运动》(第六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9。

⑥ 徐以骅:《纽约协和神学院与中国基督教会》,第180页。



的今日中国》^①和《中国人解说中国》。^②其作者分别为胡适、诚静怡、赵紫宸、刘廷芳、余日章、顾子仁、朱友渔、洪煊莲、徐宝谦、韦卓民和陈立廷等，绝大部分便出自上述两大机构。^③韦卓民1926年2月在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举办的教会教育会议上发表的题为“东西文化之综合问题”(Synthesis of Cultures of East and West)的著名演说稿，就收录在《中国人眼里的今日中国》一书中。

刘家峰教授曾分析过中国基督徒能较快走上教会领导岗位的原因：首先，他们作为第二代基督徒往往得到良好的教育，拥有较扎实的西学和神学基础，精通英文和西方礼仪，对传教士有更好的认知与同情，因而深得传教士的信任和栽培；其次，20世纪初期开始的普世教会运动以及西方差会与中国教会的合作，为中国基督徒和西方传教士同台表演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其三，20世纪初期中国民族主义、基督教自立运动和本色化运动的发展使中国基督徒进一步觉醒，开始主动承担起领导教会的责任。^④借此三点来分析中国基督徒在世界基督教界的群体性崛起，也同样言之成理。不过与日、韩两国相比，中国基督教领袖在国际舞台上的突出表现，与教会高等院校在中国的超常发达有密切的关系。韦卓民等中国基督教会的“高教系”在中国教会走向世界过程中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

三 后传教时代的中外(美)宗教互动

西方在华传教运动是中外关系史上十分重要的一页。西方基督教差会通过在华举办大量教育、医疗和慈善等机构，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可说是为中外关系奠定了文化和社会基础，传教士也因此成为中西交往的精神纽带。然而，西方教会和传教士在20世纪50年代初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全面撤离中国，也在中西尤其中美关系上投下了长长的阴影。传教运动使宗教成

① T. C. Chao, et al., *China Today through the Chinese Eyes*, London: 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1926.

② M. T. Stauffer ed., *China Her Own Interpreter*, New York: published for 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 by the Missionary Education Mov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1927.

③ 其中诚静怡、赵紫宸、刘廷芳、余日章、顾子仁等同为两本书的撰稿者。

④ 刘家峰：《从助手到领袖：1910年代的中国基督徒》，载《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2期。

为中外
度计。
不
其是上
和“
传教运
传播基
化。
后
教士不
的传老
来华传
的宗老
其
触或公
于宗教
于以下
界限想
教议思
动对中
第
教上的
动的接
经》输
大的出
第
看待宗
发生在



引适、诚静怡、赵
兼、韦卓民和陈立
月在中华基督教
化之综合问题”
女录在《中国人眼

于岗位的原因：首
扎实的西学和神学
育，因而深得传教
力以及西方差会与
供了难得的机遇；
化运动的发展使
。④借此三点来分
成理。不过与日、
与教会高等院校在
了“高教系”在中

互动

西方基督教差会通
社会影响，可说是
中西交往的精神纽
纽带运动开始后全面
传教运动使宗教成

ident-Christian Movement,
for the Student Volunteer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稿者。
《研究》2007年第2期。

为中外关系上的经常性和情感性因素，比如宗教就通常被称为中美关系的温度计。

在西方基督教会大规模撤离中国 60 年后的今天，宗教再度成为中西尤其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因素。就中美关系而言，两国之间的“精神中介”和“宗教桥梁”也不再限于传教士，或者说传教士的比重已大幅下降，虽然传教运动以各种方式卷土重来，但此种互动和交流的直接目的主要已不再是传播基督教福音。当前中美之间的宗教交流或互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样化。

后传教时代中美宗教互动呈现出如下特点：首先，后传教时代意味着传教士不再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主要精神纽带，派遣传教士也不是主要甚至唯一的传教方式，这是传教运动在中国特有的处境，因为我国政府明令禁止外国来华传教。因此早期作为中美两国之间精神中介的传教运动已被现在多样化的宗教接触和交流所取代。

其次，与传教时代不同，后传教时代的中美宗教互动不仅只限于民间接触或公共外交，而且涉及政府层面，包括宗教反恐、政府间宗教对话以及关于宗教自由问题的立法等。美国政府涉足宗教或所谓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出于以下原因：冷战结束以来宗教、民族等问题的非疆域化，美国内外政策的界限模糊，外交政策的社会关怀倾向，美国国内宗教因素的外溢（包括宗教议题外溢和宗教势力外溢）等。^①与民间交流一样，中美政府间的宗教互动对中美关系既有促进也有妨碍作用。

第三，中国是宗教大国，但不是宗教强国，而美国是超级大国，美国宗教上的超级大国地位更为突出。尽管在后传教时代中国在宗教领域已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且积极的输出者，比如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圣经》输出国之一；但中美宗教交流仍极不平衡，在贸易领域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出超国，而在宗教领域中国对美交流则存在巨大入超。

第四，对中国来说，美国的宗教输入其实最大的影响就是形成了中国人看待宗教问题尤其是宗教自由问题的外在参照系。这不仅发生于学术界，也发生在民间层面。美国在许多方面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参照系，目前在宗

① 徐以骅：《宗教在当前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的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2期，第33～38页。



教领域也越来越如此。

从所谓后传教时代的中外宗教交流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有不少有趣但值得深思的观察。首先，中国基督教神/哲学研究以及历史研究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发生重心南移，即由内地教会移至台、港教会和学术界，中国基督教会由赵紫宸和韦卓民等所代表的研究水平和研究群体已成为空前绝响，盛况难再。20 世纪 80 年代尽管国内基督教学术研究开始全面回归，目前有关领域已形成内地后来居上之势，但此种回归或者复兴主要发生在国内学术界，并无多少教会的参与。^①看来当前中国基督教三自教会在坚持“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公式”外，还要在“自我神学”（self-theologising）^②上多下工夫，方能符合当今普世基督教会发展的潮流。

其次，就教会的组织和思想建设而言，在上述同一时期东亚地区基督教会发生了重心北移，即从中国移至日本和韩国。目前虽然中国基督教信徒的绝对人数超过日、韩两国，但在教会包括学术研究、学术院校、领袖素养和社会/国际影响力在内的软硬实力方面则不及日、韩，缺乏实质性贡献，且在国际基督教界处于相当边缘的、与赵紫宸和韦卓民时代难以相提并论的地位。就纽约协和神学院路思义世界基督教访问教授一职而言，该讲座在韦卓民后便一直由其他国家的神学家担任，其中有印度神学家 6 位、韩国神学家 3 位、日本神学家 3 位；直到 2001 ~ 2002 年度该讲座才由另一位华人学者、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系李焯昌教授担任。^③

再次，后传教时代中外宗教互动的最大亮点应该是中国学术界尤其是高教界的宗教学术研究。如果说教会高等院校是当年中国基督教会崛起的学术基础，那么缺少高等学术机构的支持也是当前中国基督教会学术贫血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基督教会的学术尤其是神学发展，目前又开始与“高教系”发生越来越多的关联。过去不少当事者和研究者（包括笔者在内）对在华教会高等教育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持保留态度，认为过度发达的教会高等教育是中国基督教会难能自养、“头轻脚重”的主因之一。从现在来看，高等

① 徐以骅：《大陆、香港及台湾地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之比较及其重心转移》，载徐以骅、张庆熊主编《基督教学术》（第 7 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 1 ~ 10 页。

② 参见本辑袁场《西方传教学中“三自”理念之溯源与发展》。

③ Union Timeline, “Henry W. Luce Visiting Professors of World Christianity”, <http://www.utsnyc.edu/Page.aspx?pid=771&srcid=759>, July 27, 2010.

教育机
要条件
其实在
基督教
道运动
之策略
从而为

① 徐
页



教育机构的大力支持是基督教会发展、提高、“自我神学”以及国际化的必要条件，只不过维持和发展高等教育机构并不一定非得是教会的责任不可。其实在 20 世纪前半叶，中国基督教会就一直有联络官校学生并以此来培养基督教人才的“借鸡生蛋”策略和实践（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华学生立志传道运动^①）。在后传教时代的中外宗教互动中尽管中国基督教会并无此主动之策略，但蓬勃开展的高校学术研究势必对中国基督教会的发展产生影响，从而为中国基督教会的学术进步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有不少有趣但值得研究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基督教空前绝响，盛况空前，目前有关领袖在国内学术界，坚持“自治、自办”（self-theologising）^②

东亚地区基督教中国基督教信徒的领袖、领袖素养和实质性贡献，且难以相提并论的地位，该讲座在韦卓民、韩国神学家另一位华人学者、

国内学术界尤其是高等教育界崛起的学术团体（学术贫血的主要开始与“高教系”成员在内）对在华发达的教会高等教育人来说，高等

转移》，载徐以骅、张

”，<http://www.utsnyc.com>

^① 徐以骅：《中华学生立志传道运动的盛衰》，载上引《中国基督教教育史论》，第 204～222 页。

过程。他说：

二国运动，但我
讨论了这个问题
一个委员会被指
及基督教青年
我一次又一次

始利用手中的
言论，可以说
运动。如果用
以这样下一结

· 澳门研究丛书 ·

韦卓民与中西方文化交流

——“第二届珠澳文化论坛”论文集

主 编：珠海市委宣传部 澳门基金会 华中师范大学

出 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mail: bianyibu@ssap.cn)

澳门基金会 (E-mail: icinfo@fm.org.mo)

版 次：2011年9月第1版

印 数：500本

字 数：600千字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定 价：澳门币99元

ISBN 978-99937-1-060-8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神学院图书馆特